

稻作方式对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环境生态性营建的影响

姬琳

江南大学,无锡 214122

摘要:对影响传统村落生态环境形成的生产因素进行研究,探讨在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下,人们如何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在传统村落与人工环境之间建立起协调的生态关系。通过对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稻作经济产业利用自然资源方式特点的探讨,就当地传统村落环境“村落择址以水为邻、空间肌理以水为骨、滨水环境综合经营”的生态营建特点与当地稻作方式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与分析。在太湖流域水网纵横密布的苏州、无锡地区,当地传统村落为实现稻作生产所需,在以水稻生产为目标的指导下营建村落环境,在高效利用当地水环境资源的同时,保证了水环境的生态稳定性与延续性。这正是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环境具有高效生态性的重要体现。

关键词:生态性;传统村落;营建;稻作

中图分类号:J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0)03-0042-09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0.03.005

The Influence of Rice Planting Mode o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and Wuxi

Ji Lin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study the productiv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discuss how to establish a harmonious eco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artificial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Based on the discussi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the rice industr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uzhou and Wuxi,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featured by “village site located beside the waters, water as the bone of spatial texture,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waterfront environment” and the local rice planting mode is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In Suzhou and Wuxi, where the water network is densely distributed in the Taihu Lake Basin, the environment of local traditional village is built under the guidance of rice product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rice production, which ensures the ecological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of the water environment while making efficient use of the local water environment resources. This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efficient ecology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environment in Suzhou and Wuxi.

Key words: ecolog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struction; rice planting mode

乡村人居环境的生成、发展与成熟有着其自身的逻辑,正如罗康隆教授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对其所处

的客观外部自然环境……总是按照该民族自身的文化特点去有选择地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在其对外部环

收稿日期:2020-0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课题(20YJCZH04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姬琳(1977—),男,江西人,博士,江南大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传统营建技艺与可持续设计。

境的加工及资源利用过程中不断协调本民族内部成员行为的方法与途径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加工改造外部生存环境的结果也自然呈现出系统性差异^[1]。”然而在城市化发展日益深入、青年劳力流动频繁、农村土地经营方式急剧转变的背景下,理解乡村景观风貌特征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适应性关系,对农村地区的保护、改造和建设乡村景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保持乡村景观风貌特征的同时,对实现农村人居环境的生态更新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在经济发达、城市化发展迅速的太湖流域苏南地区更是如此。

对于传统精耕细作式的农业文化而言,村落作为进行农业耕作与农作物加工活动的主体场所,其环境的空间要素、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只有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达成彼此适应、相互和谐的生态关系后,才能保证可持续的耕作环境的形成与延续。因此,传统村落环境的生态性除了表现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外,从经济文化的角度而言,还体现在村落环境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获取、分配、利用、加工、储存、再生及保护的过程中,表现为在整体环境设计观下采取的一系列策略和方法,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生。村落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确保了自然环境的生态性得以稳定与延续,这就是村落环境系统存在高效生态适应性的重要体现。人们对于传统村落景观在视觉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认知关系,便是建立在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相匹配、相适应的基础上的。因此王剑峰教授认为大多数文化中均沉淀着保护环境意识,正是基于这一合理内核,文化才能持久地保存并得以发展^[2]。采集、狩猎及耕作等土著人的生活方式促进了可持续的生计行为的产生^[2]。以水网纵横、湖荡密布闻名的苏锡地区环太湖平原,地处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稻作经济的展开在水、土、热等自然资源条件上具有天然优势;而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技术,要求苏锡地区的传统乡村在建设时要考虑所处环境需利于提高稻作生产。在这种对周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下,形成了“村落择址以水为邻、空间肌理以水为骨、滨水环境综合经营”的极具太湖流域生态特色的村落环境模式。

一、村落择址以水为邻

地处太湖北部的苏州、无锡地区是江南水乡景观



图1 太湖流域农业种植物分布

环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太湖流域的水稻主产区^①。苏锡两地的平原占太湖流域总面积的55%,苏州南部、无锡西南部的山地和丘陵地区占总面积的16.90%。其中平原区域可以细分为苏州东南和无锡西北的水网湖荡地区。太湖流域农业种植物分布见图1。

从稻作生产的角度看^②,苏锡地区传统村落营建的生态性首先表现在择址方式与自然水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关系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村落在营建位置的选择上,结合苏锡水网平原地区的自然条件,最大化利用水体环境,保证当地水、土、热资源在稻作生产上的需求。

2)对苏锡地区水网洼地地带的沼泽、洼地等不利于人类居住的自然水体环境进行积极改造,以营建圩田的方式,在获得优良稻田资源的同时改善自然环境状况,营建出利于稻作生产与人类居住的人工环境。

以稻作经济为主导的苏锡传统村落往往与河流、湖泊等水体相邻,这些滨水的传统村落为避免潮湿、低洼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在择址方式上大体分成两类,即枕河而居、居绕水高敞处。

(一) 枕河而居

这种择址类型的村落以水网平原地区最多。村落沿河建成,村落形态生成与发展以河道为基点,呈条带状与河流平行;村落中民居分布在河道一侧或两侧;依托水系形成作为村落交通生活中心主干道,主干道路与河道平行发展;公共场所多位于桥梁、主次河道交汇处等节点空间附近,村落空间肌理较为均质,没有明显

① 明清以来,太湖流域形成了三大主要农作物,为水稻、棉花、桑树。

② 水稻喜温喜湿,根部适应在水中中长期浸泡,因此对于自然生长环境有如下要求:(1)生长环境拥有大量水源、水体,以利于日常的灌溉;(2)生长的土地需要地势低洼而平缓、便于蓄水;(3)周边地形开阔,并且不被高大的植被遮蔽,以便获得良好的日照条件。

的核心区域。

村落中,建筑、街道与河道关系密切。由于枕河而建,建筑与河道形成的结合关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街道式布局,建筑正立面平行于河道,建筑与河道、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平行于河道的道路。村落布局的核心是平行于河道的主干道、水街,河道则作为村落主要的货物运输通道,两侧是密布的商铺和民宅,部分建筑直接临水,方便货物的进出,往往形成前店后住的建筑形式。另一种是条带式沿水布局,村落核心区和商业区外围建筑的正立面多垂直于河道,山墙面朝向河流,建筑基地直接沿河道两侧布局。

这种择址类型的村落,分布于当地重要的水运枢纽地带,往往成为当地的商贸中心。例如苏州常熟市的李市村、无锡羊尖镇的严家桥村等村落是典型的现存村落代表,李市村是常熟市重要的稻米贸易集散地,而严家桥村则是无锡市东北边界重要的粮食与布匹交易市场。

(二) 居绕水高敞处

“居高”是水网湖荡圩田区村落择址的首选。圩田即围田,人们在低洼的沼泽、湖水中修筑圩坝,进行排水、造田,形成四面高中间低、水环绕圩外、稻田成于圩内的地形,见图2。由于圩内地势低于圩外的湖、河水面,圩区的村落面临着圩坝崩溃,被洪水淹没的威胁,所以人们或将村落修建在高敞的圩坝上,或营建于圩坝内地势较高的岗阜上,保证村落的防洪安全。地处无锡市西北玉祁镇的礼社村就是苏锡地区典型的圩田区传统村落。

礼社村围绕芙蓉圩的围垦建成。芙蓉圩属于中心高、四面低的覆盆圩,前身是古代太湖流域第二大湖的芙蓉湖,见图3。芙蓉湖为泄湖,地形四周高而向中心缓倾,湖中心有一高出水面10 m左右的小丘,称为玉祁大墩,墩的主体区域高度差在1.5 m~2 m之间。战国末期,楚国春申君黄歇开始围垦芙蓉湖,明朝宣德五年围垦进入高潮期。历经长期的改造,圩内低洼处的水系已被塑造成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水网,村落则营建在圩内玉祁大墩西端。村落周边水潭星布,薛家浜、朱家浜、后巷浜等十三条水浜以玉祁大墩为中心,呈放射状环绕村落。圩坝结合内外水系,进行开挖沟渠、设置涵闸等设施营建,使村落能够避免圩外洪水侵害和圩内积水内涝的灾害^[3]。

然而由于居住于圩区高处,同时圩田内的河浜与圩坝外水系的交接处设置有水闸等设施,导致水网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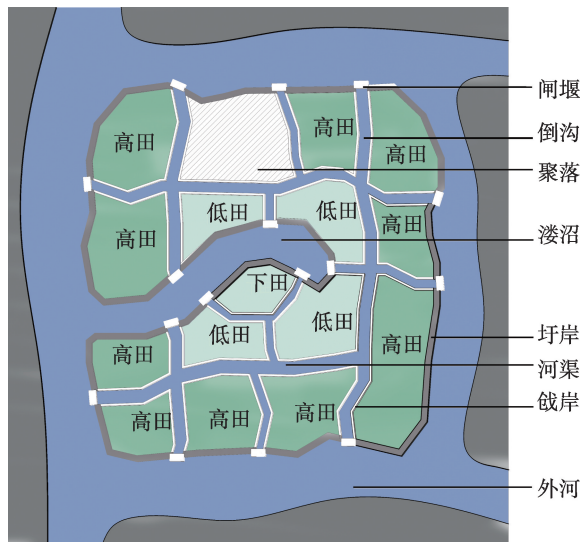


图2 圩田结构



图3 两千年以前芙蓉湖与太湖位置关系

荡圩田区村落的对外水运交通不如地处水网平原地带那么便利。

(三) 稻作生产对村落选址的生态性影响

在稻作经济主导的区域,满足稻田的用地范围与资源的要求优先于村落营建需求,因此村落在选址上首先确定的是生产环境,将利于水稻种植的环境优先作为稻田建设区,确保粮食的生产安全,然后才考虑如何安排适当的居住环境。洼地、沼泽、丘陵间的汇水区及因河流两侧冲积形成的河滩,由于具备利于水稻作业的优势灌溉条件和土壤条件,往往被优先作为水稻稻田的建设用地。

同时水稻是一种需要精心护养的粮食作物。例如水稻所需的劳作精细化程度就高于北方传统的粮食作物粟,一年所需工时是粟一年所需的三倍,当然水稻田的产量也大约是粟田的三倍。正是由于水稻种植的精细化特点,所以要求村落的位置必须邻近稻田,便于人们日常照料水稻的生长。因此水稻经济主导下的村落

坐落位置就不得不邻近于洼地、沼泽、河滩等平坦、低洼、潮湿的地带。

苏锡地区由于濒临太湖,河网密集、水源充沛、地势低洼,拥有平缓的土地、湖泊、沼泽,以及河岸周边的盆地、洼地、河滩等滨水地区,这自然都是开垦水稻田的优先选择。就水垦田的水稻种植特点正是这些传统村落邻水而居的重要原因。

在开垦稻田上,为尽量获得利于最小成本经营与管理的稻田,人们往往将大块的土地用于稻田的建设,而将较小块的土地用于村落的营建。在水网纵横地带,大块土地用于稻田建设后,剩余的边角土地才用于村落营建,因此这些土地往往就被多条溪、河切割成临水、环水的小块滨水土地。狭小的建设基地使村民必须精细规划村落的土地,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甚至是向水体要地,通过从河道、湖泊等水体中定期挖掘淤泥,填垒村落的水塘、沼泽、洼地,进而扩大村落的建设基地面,并加固河道的岸线,保护已获得的土地资源。

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山地丘陵地区中的村落,由于山地间积水面积较小,再加上强降雨在短时间内急剧汇聚,会形成冲击力巨大的洪峰,所以同为稻作经济主导的皖南、闽浙赣山地丘陵地带传统村落表现出“居高坡远溪水”的择址格局。然而苏锡环太湖地区水网纵横,大量的降水被体量庞大、数量众多的湖泊河流所蓄纳,因此洪水上涨的幅度不大且速度也较慢,对村落的危害主要表现为排水不畅的内涝式灾害。因此苏锡地区传统村落得以临水而居,与当地水环境特点是密不可分的。

明清时期,苏锡地区在人口日增的压力之下,稻田开垦开始从平原地区向水网湖荡等地势低洼地区发展,形成了“与水争田”的农垦开发状态,人们以“围水筑坝,堰湖而圩”的方式筑造圩堤,形成水行圩外、圩堤绕田,地势上四面高中间低的圩田区。

二、村落肌理以水为骨

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的营建生态性也表现在村落肌理形态与自然水环境之间的适应性关系上,主要表现为:(1)依托苏锡地区自然水环境航运便利的特点,以河流为生长基线,形成线性村落肌理形态,保证村民依托船只对稻田生产进行高效的日常管理工作;(2)村落肌理形态充分利用了苏锡地区自然水环境航运便利的特点,将河流引入村落内部,并结合陆路交通,构建出联系村落内外的交通系统,有利于进行外稻作贸易。

聚落的空间肌理要素中,空间骨骼的根本作用在

于实现交通功能,村落与交通环境的组织关系确定了村落的空间骨骼生长的初始状态与发展方向。徐谦、杨凯健、黄耀志三人对长三角水网地区乡村空间构成的要素与要素间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研究,并以水系网络为主导因素将长三角水网地区典型的乡村空间类型归纳为八种^[9]。苏锡地区滨水村镇的空间骨骼特点主要体现在建筑、道路与水体环境间的组织关系上。苏锡地区水网平原中的传统村落在空间骨骼组织形态上大致可以归纳为鱼骨形格局、“十”字形格局、网格形格局三类;而水网低洼处圩区的村落空间骨骼组织形态有着在荷叶叶脉状水系环境条件上形成的水陆结合、线性发展的结构特点。

(一) 鱼骨形格局生成模式

太湖流域水网地区密集纵横的河道会将土地切割成大小不等的地块。无论水网平原的地形多么平坦,水流条件、河岸线环境较为复杂的河道交叉处都是不利于船只停留的,因此河道的中段河岸,由于平稳的水流利于停船、平直无遮挡的岸线利于观察交通情况,就自然成为村落营建的理想起始位置。村落从河道中段开始营建,沿河道向两端发展,延伸至河道两端汉口处,带状的村落空间形态便依托于河道开始出现。由于初期建成的村落只在河岸的一侧建设与发展,各家各户为获得良好的水运环境,必然选择沿河建设住宅单元,沿河道岸线建设平行于河道的交通干道,这就形成了最为初始的线形村落发展主轴,村落空间骨骼的单线形态也就此形成。住宅单元面河营建,背后则往往建设为菜园、果园,因此若干住宅单元联排形成一个个线形组团,组团与组团之间留出巷道,通往组团背部的菜园、果园种植区,单侧鱼骨形的空间骨骼雏形就形成了。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村落会跨越河流的阻碍,进入河对岸发展,两侧发展的鱼骨形的空间骨骼便得以形成。

这种村落肌理结构在苏锡水网地区最为常见。例如苏州市太湖东北岸的望亭镇,在靠近太湖附近水网的平原地带,大量的村落空间肌理以单侧鱼骨形或双侧鱼骨形的空间骨骼形态构成。

(二) “十”字形格局生成模式

由于河流对地块的限制,村落沿河岸发展会在河道交叉处受到限制与影响,当两岸发展再次被河道阻断时,单一地块上的村落形态便会在交叉处转折,村落“一”字形的线形就会变为“L”形。河岸两侧“L”形相对的村落形态即发展为“丁”字形。如此进一步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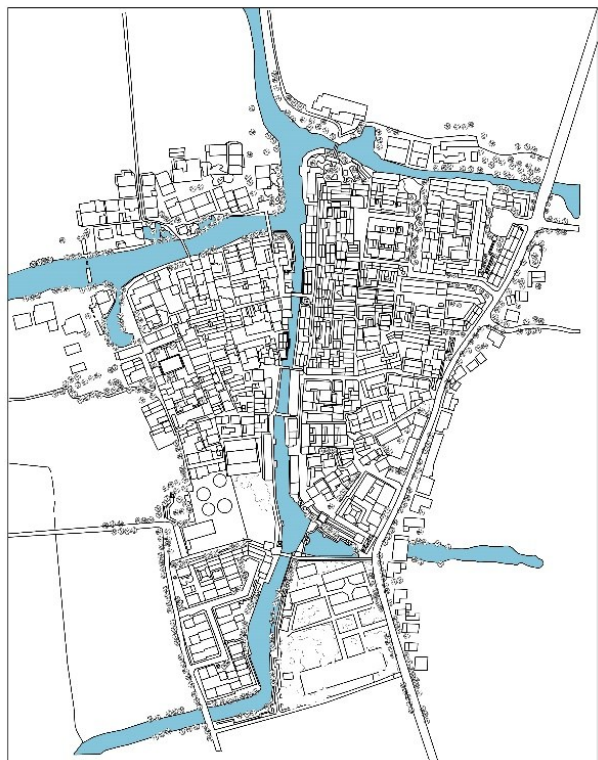


图4 无锡市羊尖镇严家桥村平面

“十”字形、“丰”字形和“井”字形的村落空间骨骼便形成了。常熟市的李市村和无锡市东北角的严家桥村便是这类传统村落的典型代表,见图4—5。

(三) 网格形格局生成模式

在水网密度相对较小的水网平原地区,如果村落所处的地块面积够大,村落发展到两端的河道汉口处,或者河道环境发生变化(如沿河地势变为沼泽)时,村落会转向地块内部发展,单侧鱼骨形空间骨骼中旧有的巷道就会成为村落次干道。村落次干道再向两侧生出巷道,便开始呈现出村落网格性空间骨骼雏形。

(四) 水陆结合、线性发展

苏锡水网洼地一带的圩田区传统村落中,圩区水系的结构多呈荷叶叶脉状。由于村落多处于圩坝、岗阜等高处,所以纵渠、横塘、湖漾多难以伸入村落内部,而是围绕村落周边形成圩区内的“荷叶叶脉”,而围绕圩坝的外河则构成了“荷叶外缘”。圩区内部叶脉状的渠、沼、河、浜等各色水体多为具有封闭盲端的线形河道,是村落通往圩坝外部的的水运干道,河道的盲端多朝向村落方向,是村落水运的起始端,也是圩田区内水陆交通的转换节点。

由于圩田区的渠、沼、河、浜等河道多具有封闭盲端,所以这些水体构成的叶脉状水网难以形成覆盖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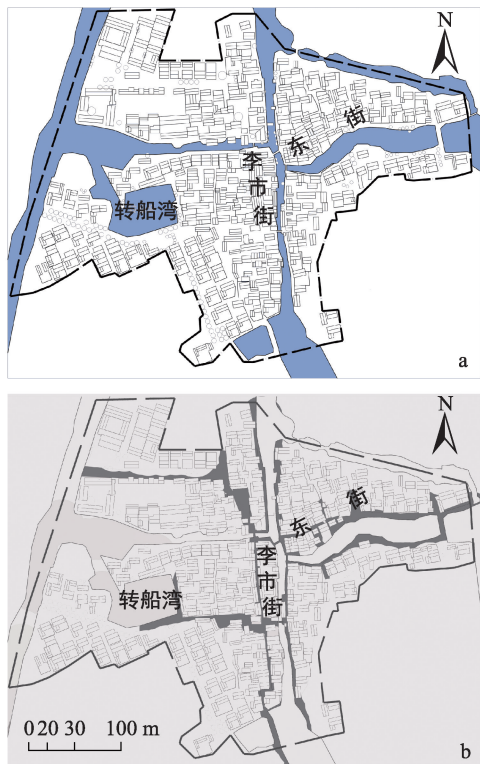


图5 常熟李市村“十字式”水系(a)、“井”式”道路(b)结构

圩区的运输水道,因此圩内交通需要存在一定的陆路交通主干道路。结合叶脉状水网形成的水陆并重的交通网线,其主干村道常以穿越村落的方式串联起圩区内的各个村庄,再连接外部交通干道。而结合了水陆交接点(转船湾)的广场等公共场所一般位于各村庄的中心区域,使得圩田区村落空间形态具有强烈的向心性。

例如无锡市玉祁镇礼舍村,薛家浜河道由西向东伸入村落内部,河道盲端形成水面面积较大的转船湾,转船湾再与毗邻的中心广场结合,并结合由南而来的陆运主干道路,构成村落内外交通环境的水陆干道交接点与换乘处,共同形成村落的核心。南来的陆路交通主干在转船湾处向东折,成为薛家浜河道交通线路的陆路延伸,与薛家浜一并成为村落的生长主轴,并成为村落商业街区的核心轴线,见图6。

(五) 稻作生产对村落肌理的生态性影响

苏锡地区稻作经济主导下的传统村落空间骨骼结构之所以与毗邻的水系结合紧密,一是因为稻作经济在生产上需要便利的运输环境,而村落坐落的位置是为了便于水稻种植作业开展而确定的,村落与稻田之间的交通条件需要满足稻田平整、水稻种植、日常照看与往来及肥料、秧苗、稻谷运输要求;二是因为以稻作经济为主导的生计方式的村落,其各项生活、生产资金



图6 礼舍村水系

来源主要依靠售粮所得,因此对村落所处地址的交通条件要求也较高,需要便于运输与贩卖稻谷。

苏锡水网地区平坦的地形地势下,航运条件良好的众多河道对村落而言无疑是良好的交通通道,以船为车也就成为生活、生产的日常所需。在太湖流域由于航运条件的便利性和普及性,使传统村落的生成与水文交通环境联系紧密。河道就成为形成聚落生长的基线,与密布于聚落内部的街巷共同形成水陆混合的交通环境,从而形成河道中穿梭来往的船只与毗邻的街巷行人交相辉映的太湖流域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的典型街景形象。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水网平原地带还是水网洼地地区,苏锡地区传统村落中的水系形态都奠定了空间肌理结构的基本形态与演化逻辑。这些传统村落利用当地水网环境资源,有效地实现了稻作生产的展开与贸易的便利,当地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生态性也就体现在村落空间骨骼肌理的依水形成的过程中。

三、滨水环境综合经营

苏锡地区村落的环境营建内容中,河道环境有着核心性的地位。苏锡地区的传统村落在滨水环境营建上,依托河道的水环境资源有着明显的生态性,主要体现在:(1)村落内部河岸环境的综合经营,有利于稻作生产所需河肥的形成;(2)村落内部河岸环境的生态保护性营建有利于保证水环境的安全;(3)洼地取土的规划性开采与种植、养殖区综合性营建;(4)村落河岸交

通空间环境的营建有利于开展对外贸易。

“居水网纵横处,以河道为核心”是苏锡地区传统村落的环境结构特点。滨水环境作为村落生活、生产活动的重要发生环境,在村落内部的沿河空间环境的营建上,其结构模式必须与村落的各项农业生产紧密联系。

(一) 河岸环境的综合经营

苏锡地区村落农舍区的沿河建筑为南北朝向建设,并依据与河道的平行或垂直关系,避免建筑过于紧邻河道,精心安排农舍与河道之间的空间,用于农业生产和副业养殖,在河道沿岸饲养家禽和种植蔬菜果木,这样处理有着下列益处:(1)利于饲养鸭、鹅等水禽;(2)利于灌溉菜地、果木;(3)利于河道积肥、罾泥;(4)利于柔化保护河堤;(5)利于排水;(6)利于圩岸的土壤堆迭,增强村落的抗洪性。

而当农舍区建筑正立面与河道垂直时,农舍则多用院落作为农舍单元形制。在院墙内种植蔬菜和花果树木。

(二) 河滨水岸的生态性保护

在圩内的村落中,为保证河岸的坚固性和安全性,河滨岸线的加固处理有硬化处理与柔化处理两种。岸线的硬化,主要是使用花岗岩砌筑而成,并间隔一定的距离在护岸的石块上开凿出“系缆孔”用于停靠和栓系船只,多出现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商业环境之中,而在以农舍为主体的村落环境中,农人则结合鹅、鸭的养殖和花果树木的种植柔化处理滨水水岸。

太湖流域的圩岸多植以各种树木,深植于堤中的树根勾络在一起,成为护堤的屏障。其中种植最多的是杨柳,诗人杨万里所作的《诚斋集》(圩田)中就有“古来圩岸护堤防,岸岸行行种绿杨”,描写的就是杨柳护岸的情景。

例如礼社村的滨水岸线,硬、柔两种处理方式皆有。在商贸交通往来频繁的薛家浜河道两侧,人们用花岗岩砌筑出护岸和码头。而在村落北面以农舍为空间主体建筑区域,农舍紧邻河滨岸线上,在房前屋后,农人们自村落外缘依次以种植芦苇、树木等方式,利用植物的根系固定河岸的泥土,实现对于河岸的柔性加固,见图7。

(三) 洼地取土的规划性开采与种植、养殖区综合性营建

圩田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加,村落范围也日渐扩大,



图7 礼社村“硬质-柔化”的沿河岸线处理



图8 礼社村转船湾

村落坐落的高地面积已不足以容纳更多的建筑营建,因此一些村民不得不在地势低洼的地方营建住宅单元,并在更为低洼之处开挖泥土用以垫高低洼的建筑基地,久而久之开挖出的池塘或结合圩内的河浜,成为转船湾、蓄排水河道,或是变为封闭的池塘,用于消防、渔业养殖。礼社村西面的组团便是在移来泥土垫高的基础上营建而成的。

(四) 河道交通空间营建

转船湾是太湖流域传统滨水聚落中十分常见的空间环境要素。太湖流域滨水聚落的居民多使用船只作为日常生活、生产的交通工具,家家户户皆备船只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而滨水聚落环境中的河道就是船只交通往来的要道,在主干交通河道中,就必须设立较为宽阔的水面用于船只转换航向,见图8。转船湾的形态可以分为:末端式、分叉式、交汇式和拓宽式等类型。

河岸紧邻街道,并用花岗岩建设大量码头,较好地解决了村落内部陆路交通与水陆交通的衔接关系,结合毗邻的村落广场,使得转船湾一带交通十分便利,成为车水马龙、聚集人气的商贸核心区域和交通枢纽,人流量的大量聚集,使得展开商贸活动的条件也十分便利。

(五) 稻作生产对滨水环境生态性的影响成因

对水网纵横的苏锡地区水稻生产而言,河道不仅只有便于交通、灌溉的利处。由于地处太湖之滨,溪河众多,这样的环境条件有利于人们进行围河泥等积肥活动。

周邦君先生指出^[5],地表的细土、落叶、垃圾、粪便时常被风雨带入河、湖、港、汊、塘、沟之中,与水下的泥土、水生生物的排泄物和遗体混合,经过较长时期的理化作用,形成腐殖质含量较高的肥泥;周邦君先生同时认为围河泥在江南日常稻作生产中的地位突出,太湖流域围河泥肥田方式与水稻壮秧管理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江南地区的农民做秧田时,需要用新鲜的河泥作为稻种的秧基,这样的施肥方式有助于水稻壮秧的培育,是促进水稻在本田进一步正常生长的先决条件。

李伯重先生也指出^[6],江南水稻生产中,以精细化劳作为特点的人力资本投入在明代以前即已接近传统技术所能达到的极限。因此明代以后直至民国时期,江南水稻生产以肥料为中心的资本投入成为当地的显著特点,而肥料短缺的现象在明末时期就已相当严重。在肥料极端匮乏的资源背景下,众多河道底部富含有机质的河泥就成为苏锡地区稻作生产的重要肥料

来源。

河岸环境的综合性营建,不仅有利于增加农家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还有利于促进河泥的生成与聚积,并结合每年的罾河泥活动,同时达到了河道深挖泄洪和为稻田积肥的目的。

苏锡地区传统手工业发达,但丝绸织造、刺绣、家具制造等高端手工业主要集中于苏州、无锡、昆山、常熟等较大型城市,缫丝、土布纺织等低端手工业则分布在广大乡村,村落中的商业集市是沟通乡村与集镇、城市的最底层的物资集散地和转运点。为了便于将农产品运往集镇,建成良好的水运环境,水网纵横的苏锡乡村就变得十分重要。高拱的石拱桥、码头、市河河岸、沿河街道、廊道和转船湾都是为了便利船只往来、停靠、转运货物而建立起来的。

苏锡水网地区的村落环境的生态适应性营建是以“水”环境为核心,是在水网环境获得土地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实现土地的综合、高效、可持续利用及村落交通环境优化的问题。

并且苏锡地区河道水网不仅仅是交通往来的航运水道,由于便于灌溉和利于鹅、鸭等家禽养殖,所以也是各种家庭副业生产活动的依托。因此苏锡地区的村落中农人的家庭副业,多以紧邻河道的家禽养殖和零星花果、蔬菜种植等展开布局。对于以稻作生产为主导生计方式的太湖流域苏锡地区村落而言,临河道而聚居,可以带来十分优厚的生产效益。

四、苏锡稻作村落环境生态性营建

传统乡村聚落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在生态性上有着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能主动应对,消除不利因素,确保各种农作物、经济作物的稳产和高产的特点,而农耕技术的特点也会要求有相应的环境形态予以呼应适合。李明认为:“苏锡地区的人们习于顺应水域优势,在河边挑石为基,构筑枕河人家;在乡村,‘数间农舍水村边’乃常见之景象。乡村农舍的材料、结构和布局,无不反映出稻作生产与地理环境的合力推动^[7]。”

以稻作生产技术为特点的太湖流域苏锡地区,为保证稻作经济的实现,必然要求村落的环境营建对以水网纵横的洼地、平原为主的环境作出反应,获得稻田资源与肥力,并保证实现水稻运输与贸易。因此导致苏锡地区的传统村落对水体环境的营建与处理指向三个目标:(1)向水体要地,在村落环境的营建过程中,通过对水、土资源的优先使用次序和精细规划、改造,保

证作为村落生存基础的稻作经济的实现;(2)建设良好的村落运输环境,保持村落河道水运对外交通的通畅性和承载性,从而形成具有苏锡地区特点的传统村落空间骨骼;(3)通过对河道岸线等滨水环境的综合经营,在获得经济之利的同时,增加河泥的有机质,利于河底淤泥的肥性增加,实现农业生产肥田、养土、取土的可循环性。通过岸线的生态安全处理,保证村落的防洪安全。

由此可见在苏锡地区水网密布环境下的传统村落,环境的生态性营建是以“水”环境为核心的,在从水网环境获得土地的基础上,解决土地的综合、高效、可持续利用问题,以及村落交通环境的优化问题,最终以稻作生计为基础、水环境为核心,营建出以邻水而居、水运为骨、滨水经营的传统聚落环境,这正是太湖流域稻作地区传统聚落生态适应性营建活动的典型特征。

任何成熟的聚落环境视觉要素与特征形成,其背后必然有着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活动需求。正如丁沃沃教授指出的,从土地获得丰厚回报的江南人,历来有着善待土地的习惯,村落的选址和造屋都体现出对自然的理解,散、聚相结合的模式投射出对土地资源的尊重^[8]。就乡村的环境生态性规划设计而言,以下应是在规划设计之初便予以重视的内容:(1)关注乡村产业经济变化带来的乡村景观环境构成新要素,并有效组织与设计好这些新的环境要素与自然环境的生态适应性关系;(2)认识到农耕时代形成的传统环境要素是在历史背景下适应产业经济影响所形成的结果,在保护与继承这些传统环境要素时,应关注是否有相关的产业结构对其进行支持与维护。

五、结语

乡村产业经济结构的变更将带来新的乡村环境构成要素内容的变更,并对乡村传统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例如以汽车为主导的陆路运输已占据物流业的主导地位,江南地区航运衰败导致乡村货码头、转船湾等传统滨水景观的衰败与消失,进而影响乡村肌理结构的改变,使得大量村落形态的发展轴线开始偏离河流等线性水体环境,转而依托于公路进行生成与发展,形成了不同以往的村落肌理结构。如果无视产业变化带来的景观结构要素变更,盲目“夺回”水乡风貌设计,很有可能非但不能复兴滨水环境活力,反而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文献

- [1] 罗康隆. 论民族生计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关系[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5):45.
LUO Kanglo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ay of National Livelihood and the Living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5):45.
- [2] 王剑峰.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土著传统[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4(5):6-11.
WANG Jianfeng. Indigenous Tradition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J].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4(5):6-11.
- [3] 耿橘, 孙峻. 筑圩图说及筑圩法[M].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980.
GENG Ju, SUN Jun. Construction Fair Drawing and Construction Fair Method[M]. Beijing: Agriculture Press, 1980.
- [4] 徐谦, 杨凯健, 黄耀志. 长三角水网地区乡村空间的格局类型、演变及发展对策[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2, 33(3):336-340.
XU Qian, YANG Kaijian, HUANG Yaozhi. Types, Evolutio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Rural Space in Water-net Area of Yangtze River[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2, 33(3):336-340.
- [5] 周邦君. 《补农书》所见肥料技术与生态农业[J]. 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农学卷, 2009, 6(1):102-106.
ZHOU Bangjun. Fertilizer Technology and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n the Book of Replenishing Agriculture[J]. Journal of Yangtze University(Nat Sci Edit), 2009, 6(1):102-106.
- [6] 李伯重. 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一[J]. 中国农史, 1984(1):24-37.
LI Bozhong. The Improvement of Rice Production Intensi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J]. 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1984(1):24-37.
- [7] 李明. 从生态民俗角度比较明清苏州与徽州区域民俗文化[J]. 民俗研究, 2006(1):137-159.
LI Ming. Comparison of Regional Folk Culture between Suzhou and Huizhou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Folk Culture[J]. Folklore Studies, 2006(1):137-159.
- [8] 丁沃沃, 李倩. 苏南村落形态特征及其要素研究[J]. 建筑学报, 2013(12):64-68.
DING Wowo, LI Qian. Study on the Morphological Identities and Its Elements of Southern Jiangsu Village [J]. Architectural Journal, 2013(12):64-68.